

· 敦煌文献研究 ·

专栏导言

北京大学 荣新江

“敦煌文献”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“敦煌文献”指的是敦煌地区发现的各种竹简、帛书、石刻、纸本上所写的文字材料,从内容上来看,可以大略分为正规的“书籍”和公私“文书”。狭义的“敦煌文献”仅指书籍的部分,而不包含公私文书。我们一般说到敦煌文献,主要指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,其实还应当包括土地庙塑像、莫高窟洞窟各处零星出土、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的文献。

我们说到的狭义的敦煌文献,一般是指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。这些写本时代的书籍,为我们今天研究“写本时代的书籍史”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,因为写本书籍不像印本书籍那样规范。敦煌写本书籍为我们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写本,既有不亚于刻本的精抄本,也有错字满篇的学生作业;有些是用西北方音记录的文本,有些是充斥着大量俗语、口语词汇的文字;有些是为某种特殊目的而摘抄的文本,有些是作者还没有确定下来的稿本。从形制上来看,除了最主要的卷轴装写卷外,还有经折装、册页装等各种不同的形态,呈现出写本书籍发展史的完整面貌。

敦煌写本书籍为近年来的社会史取向的书籍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,我们不仅可以对比精抄本和摘抄本的不同,还可以讨论大量民间抄写的书籍,特别是书仪、占卜、医药类文献的社会功能。本专栏所收的史睿《敦煌写本书籍史研究路径的探索》一文,是探讨敦煌写本书籍史方法论的综述,有作者不少新的见解;张小艳、郭丹《敦煌写本 P. 2044V 诗偈作者考述》一文,既是传统的考订文献作者的力作,也揭出一个书籍史中文献传播的佳例;冯婧《敦煌册子本的缀合与复原——以佛经册子为例》一文,则是在亲自观察敦煌册子本的基础上,对佛经类册子本物质形态研究的重要推进。

广义的敦煌文献中的公私文书的研究,经过百年来学者们的发掘和探讨,似乎已新意不多;但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敦煌文献,仍然会提供一些珍贵的资料。当许多学者扑向日本杏雨书屋公布的“敦煌秘籍”时,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中属于“三千残片”和原“新”字号的部分,其实也保存有大量的贵重文书。包晓悦独具慧眼,在《国图藏唐天宝年间敦煌县印历考——兼论唐代县级的司土类政务运作》一文中,不仅通过对原件的观察,整理出这组珍贵的盛唐时代敦煌县印历文书,还借此研究了印历中涉及的兴修水利等各项事务,有助于深入认识地方社会的运作。

冠以“敦煌”之名的敦煌文献虽然出土于敦煌,其实里面包含有大量各地传入敦煌的文献,其中尤其以唐朝都城长安的文献最多,这可以从佛典、道经、儒书的题记,以及律令格式文本背面所钤的印鉴中看出。这些文献为研究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帮助,比如可以透过佛典、道经写本研究长安的佛寺和道观,通过灵州地区产生的文献阐明这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,由成都传入的写本和印本印证唐末五代蜀地印刷术的发达,从完整的于阗语长篇佛典一窥于阗王国佛教的辉煌。这类文献在“敦煌”之外的价值,还有许多题目有待发挥。宛盈《敦煌文献所见长安地区寺院写本生成举隅》一文,就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长安写本书籍生产的一个例子。

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主要以写本为主,虽然有少量的印本,但除了咸通九年(868)刻本《金刚经》外,大多数都是小本的佛典、佛像、历日等,属于印刷史上的初期制品,水平不高。但敦煌藏经洞封闭之后,当地的佛教活动仍然继续,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文献填补了我们对宋代、西夏时期、元朝敦煌地区佛教文化的认识。徐伟喆《新公布的敦煌研究院藏宋辽金印本藏经残片研究》一文,根据《甘肃藏敦煌文献》新近公布的莫高窟北区出土刻本残片的高清彩色图片,比定出宋朝的《开宝藏》、辽朝的《契丹藏》、金朝的《金藏》,大大丰富了对晚期敦煌文献的认识。

敦煌文献还有一个与中原传世文献不同的特点,就是拥有大量的胡语文献,包括古藏文的大量书籍,还有粟特语、于阗语、回鹘语的珍贵文献和公私文书。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献中,则有大量藏文、西夏文、回鹘文、蒙古文所写的文献。本专栏所收哈斯巴特尔《元代蒙古文刻本〈彰所知论〉——敦煌文书B163:40-1、B163:40-2再考》一文,从北区出土刻本中比定出蒙古文的重要典籍《彰所知论》,极其难得。

本专栏虽然只有七篇文章,但却代表了目前敦煌文献研究的多个新的发展方向:敦煌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,敦煌写本文献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,写本书籍形态正在得到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总结;陆续公布的敦煌文献中仍然包含有重要的公私文书需要深度解读,敦煌文献中的外来文献可供探讨其他地区社会文化之用;莫高窟北区的印本和胡语文献,也能开拓出敦煌文献研究的新天地。这些文章即使不能面面俱到,亦足供读者据以举一反三。相信此类文章在《文献》杂志的陆续刊出,会推动对中国古代文献与文化众多面向的深入理解与研究。